

中华道德五千年

(19)

现代中国的道德演变与德育理论(之一)

冯克诚 蒋卫杰 宋武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华道德五千年

<19>

学术顾问：王炳照 阎国华

执行主编：冯克诚 蒋卫杰 宋武

现代中国的道德演变与德育实践

(之一)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道德五千年/冯克诚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3

ISBN 7-5034-0922-3

I. 中… II. 冯… III. 伦理学-历史-中国 W. 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407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通县京华印刷制版厂

装 订: 密云渔家台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00 个印张 字数: 2000 千字

印 数: 1—3000

版 次: 1998 年 2 月 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00 元 (全套 20 本)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 目 录 ◇



现代中国的道德演变与德育实践

概 述	(1)
现代德育中的“德”“寡”二先生	(4)
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	(17)
现代德育中的公德论	(22)
现代德育的红专人才理想	(30)
李大钊提倡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与“工读”	(41)
蔡元培的“劳工神圣”与“工读”	(44)
“科玄论战”中的道德认识	(51)
民主主义与平民教育	(57)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平民教育	(60)
资产阶级平民教育的“个性”与“群性”	(66)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中的道德理论与德育实践	(70)
余家菊反对工农运动的国家主义教育之真谛	(78)
李璜的“沟通个体情感”教育	(80)
陈启天的“立国精神”教育	(85)
中国共产党对工农群众教育的主张	(87)
苏区教育的方针和政策	(90)
革命根据地开辟时期的“共产主义教育”	(96)

“共产主义教育方针”的失误	(98)
“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	(100)
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	(103)
干部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105)
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108)
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	(111)
三民主义道德理论与德育实践	(119)
“党化教育”	(120)
三民主义教育的倡行	(122)
三民主义教育的蜕变	(125)
“戴季陶主义”、“四维八德”的复古逆流	(127)
蒋介石的所谓“健全人格”	(132)
朱家骅的教育训育须打成一片	(138)

现代中国的道德演变与德育实践

概 述*

这段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一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彻底解决这一矛盾，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最先高喊爱国口号的是一批掌握了西方先进文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即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勇猛地向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传统文化发起了毫不留情的进攻，从而开启了中国德育思想的现代发展进程。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南，力图把马列主义的基本

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行结合的艰辛探索中萌生了初步的新民主主义德育思想。这种新民主主义德育思想的萌芽，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中国共产党实际地参加并领导了包括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在内的伟大实践，而发展为完备的新民主主义德育理论。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现代德育思想发展的主流，也是现代德育思想所获得的最为丰硕的成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德育理论相呼应，一些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德育思想家、教育家继续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在德育领域内坚韧不拔地探索着、实践着。他们的德育思想虽然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温和的改良主义色彩，但他们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对人民群众的挚爱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有益继承使得其德育思想熠熠生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德育思想的重要补充。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代表，其德育主张亦在现代德育思想的发展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这一德育主张曾发生了从革命的三民主义向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的逆转，其间夹杂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复古倾向，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精神，也偏离了中国现代德育思想发展的主线。正因为如此，它终于堵塞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生命是短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德育理论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原先的新民主主义德育理论便开始向社会主义德育理论转变。社会主义德育理论首先是对新民主主义德育理论的扬弃，它

删除了一些已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的具体历史任务，保留了与中国共产党最高纲领相适应的、与中华民族优良美德相一致的、具有鲜明特色而又一般适用的德育原则和规范。这种扬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德育主张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具有连续性和彻底性。同时，社会主义德育理论又是新民主主义德育理论的向上发展。它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确立起来的具体现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岁月里，毛泽东带领全党为创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理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但其中有一些观点是不适当的。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中，对毛泽东的德育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反思，用改革开放的时代内容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德育理论。它作为社会主义德育理论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开放性特点。可以预期，在他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德育理论思想必将跃升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和更新的发展水平。

应当看到，在现代德育思想的发展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德育领域内流派纷呈，彼此间充满着复杂的斗争，而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德育思想。这种从“多”到“一”的发展趋向，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即中国人民从解救中国到建设中国的实际历程。现代德育思想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德育的发展方向，初则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继则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使中国德育思

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而中国共产党人德育理论的诞生则最终实现了中国德育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性变革。这一革命性变革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是中国人民在经过百余年来的探索奋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必然结果。与德育思想史上的这一革命性变革相适应，现代德育思想以博大的宽广胸怀，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具有进步因素的优秀德育思想成果，继承了中华民族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德育思想，它们最终以一种辩证扬弃的形式被集中地包含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德育理论之中。

现代德育中的“德”“赛”二先生*

现代中国的德育思想离不开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加剧了中国社会业已存在的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引发了“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冲突和对立。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依然故我。它们非但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反而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一全新的思想理论推动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于是，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这种历史的演变相适应，中国的德育思想亦随之获得了新的进展。这种新的进展最初是以“德”、“赛”为旗号的。

1.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道德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肇始于“五四”运动之前，其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自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编者是陈独秀。后因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于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遂从上海迁至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由起初的陈独秀主编扩大为同人刊物，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七人共同组成编委会，七名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这样，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新文化阵营。他们在对封建主义的激烈批判中，为中国现代德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首先，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而袁世凯旋即又复辟帝制的急剧的政治变幻中，清醒地意识到要有效地实施其政治主张、贯彻其德育思想，必须着眼于后代，寄希望于青年。《青年》杂志在宣布编辑方针时，直截了当地指出：“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杂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通讯（答王庸工）》，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面对晦暗如磐的中国政治局面，李大钊以悲壮的爱国热情和“再造神州”的雄心大志，要求青年人“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号）鲁迅则痛感在封建的父权主义的束缚下，孩子永远不能超越父辈、超越过去的社会病态，向为

人父者提出了一个似乎极寻常然而却又极严肃的问题，即：“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号召说：“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全集》第1卷，第246页）可见，“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之类的表白，纵然不能说是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但他们确实是要用自己所崇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德育思想来塑造青年、改造国民。这无疑正确地指明了德育对象的重点所在，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及其对未来的乐观自信精神。

其次，针对“五四”前夜尊孔复辟的反动逆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以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抨击。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是以孔子学说为核心内容的儒家理论。中国古代的德育思想自然也是以孔子思想为基本原则的。虽然孔子学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曾经发生过巨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之所以如此持久，乃是因为它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然而也恰恰是这种适应，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和死寂。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迅速瓦解，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孔子学说一统天下的现实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以一种新的思想来取代孔子学说的客观要求。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当着袁世凯上演复辟闹剧的时候，“尊孔”“读经”的陈词滥调便一时喧嚣尘上。这就更强烈地激起了人们对孔子学说的憎恨，终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高潮。

从德育思想发展的角度看，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把反孔

的锋芒直指封建礼教。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第一篇公开点名批评孔子的文章，易白沙的《孔子评议》只是就孔子学说何以被历代统治者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剖析。而陈独秀、李大钊则进一步从孔学的要害入手，揭露其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陈独秀指出：“儒家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一一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独秀文存》卷1，第45页）吴虞和鲁迅着重对旧礼教、对封建道德中的夫权主义和父权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吴虞认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干”，“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新青年》2卷6号）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记》中，愤怒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新青年》4卷5号）他还特别着重地批判了封建道德中的夫权主义和父权主义，从而控诉了封建旧道德的罪恶。

再次，鉴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的特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主张从伦理问题入手，进而变换全国人民的思想。

近代以来，中国远远落伍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许多志士仁人一般都从对中西方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和强烈反差的对比中，获得某些可资借鉴的启示。新文化运动中，这方面的认识继续深化。当时人们意识到，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是近代西方领先于中国的根本所在。所谓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政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就集中地概括了中西之间的主要不同之点，生动地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人在经过痛苦深刻的反省之后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理性高度。在以上述“四提倡四反对”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无疑是两面旗帜（即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而这两面大旗的牢固竖立却首先有赖于扫除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道德，而代之以新思想、新道德，这样思想启蒙的问题便突现出来。陈独秀认为，在思想启蒙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伦理思想的启蒙。他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此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惛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如若“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新青年》2卷3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即在于“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些富有

战斗性的论断不仅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一般性的号召引向对封建伦理思想的具体批判，而且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德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示了新的起点。

最后，在对旧思想、旧道德的猛烈批判中，中国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逐步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一般说来，新文化运动初期，投身于思想启蒙的战士们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文主义和个性主义，即资产阶级的人权平等自由。他们虽然主张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但在社会历史观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进化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这就使他们在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时，常常对自己手中运用的武器采取不加分析的肯定态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当地夸大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忽视了中国实行社会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地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踏上了通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前进道路。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旧思想、旧道德流传已有几千年之久，“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辨认，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之”。他开始领悟到，思想启蒙固属必要，但必须与革命的手段结合起来。他说：“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虽然毛泽东这时尚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对于西方思想所采

取的分析态度以及对于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的独到见解，为其最终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有益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在思想上的这些变化，预示着指导中国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论武器正在经历着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演进过程，而后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这一转变对于中国德育思想的革命性变革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一次认真的清算。它之所以能够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声势，是和当时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并为之服务的。中国社会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极为错综复杂，这些政治势力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它们的世界观、宇宙观亦大相径庭，这就逻辑地决定了以对封建道德的批判为发轫，中国现代德育思想的发展必将充满着激烈的纷争。这一纷争的最终结局，又是以社会历史领域内各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实践为最后的裁决。

2. 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德育

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五四新文化运动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德育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如果说在此之前急进的知识分子是借助于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思想理论来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那么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的传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便转而在介绍、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中，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察和解决包括德育思想在内的一系列中国问题。这种努力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阐明德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马克思主义

的德育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另一方面则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可贵的德育主张。

就前一方面而言，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已经从单纯依靠思想启蒙来拯救中国的理想王国中挣脱出来，主张通过阶级斗争，首先解决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进而推动教育等各项具体事业的发展。针对胡适片面夸大教育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主张从教育入手对社会进行点点滴滴改变的观点，李大钊明确指出：“不可一概而论”，在现时的中国，“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每周评论》第35号）而要实现经济组织的变动，还需进行“阶级竞争”，即进行“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陈独秀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认为，唯物史观的要义就是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均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据此，我们在创造未来的历史时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溃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跟着崩溃，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的主张，不可蔑视现存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新青年》9卷4期）正因为如此，虽然中国人在知识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很不发达，需要发展教育及工业，但这种教育和工业的发展，必须用社会主义思想来进行指导，而不能重蹈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复辙。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中

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初步接触到中国的教育改革应当遵循何种方向、走何种道路的问题，初步认识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改造与发展教育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观点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尚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是在划清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之间的界限时所不能动摇的。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理解，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现状，提出了关于教育方面的德育主张。他们从政权与教育的关系出发，提出了改革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劳苦大众争取教育权的斗争问题。毛泽东认为，在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来谈论人民的教育权，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现在这三样东西全在资本家的掌握之中。资产阶级凭藉着他们手中的政权垄断了全部的教育权，劳动人民的教育权利必然被剥夺殆尽。但社会的文明全是劳动大众创造出来的，因此劳苦大众理所当然必须为争取自身的教育权而斗争。为了争得这种权利，工人阶级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首先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进而才能取得人人机会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为了争取劳苦大众的教育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结合起来。李大钊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化，从根底输到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李大钊选集》第146页）毛泽东也提出“民众的大联合”的口号，主张先实行各个阶层内部的“小联合”，然后进到一个全体民众的大联合。这种大联合的思想自然也包蕴着